

黄镇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圣贤

论读书明志

中国修养文库 中国修养文库 中国修养文库 中国修养文库

中国圣贤论读书明志

黄镇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马 清

封面设计:王玉辉

中国圣贤论读书明志

黄镇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汕尾市岭峰教育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46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22-02150-7/G.244 定价:14.50 元

导 言

人类以智慧创造了书籍，书籍以知识滋养着人类。

读书是人类特有的一项精神文化活动。当人类历史尚在黎明时期，书籍已具雏形。自书籍诞生之日起，读书就开始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成为人们获取知识、陶冶情操的基本手段和重要途径。历经数千年的文明演进，虽不能说人人喜爱读书，但人人需要读书则决无可疑。

中国有着 5000 年文明历程，追寻中华民族从刀耕火种、结绳而治的上古时代一路发展而来的漫漫历史，时时能感到倡导读书的至淳风尚。先秦学者荀况一篇《劝学》，循循善诱，风靡千古；历代莘莘学子矢志追求，勤奋苦读，硕果累累。“人家不必问贫富，但有读书声便佳”，中国读书传统的沃土，培育了无数胸怀大志、自强不息的仁人志士。

读书与治学自来关系密切，宋代大文豪苏轼曾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这样归纳两者的关系：“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读书为治学之始，治学成果转而为人提供新的可读之书。且从孔子以“韦编三绝”的阅读精神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至理名言昭示后人起，历代儒林宗师、硕学名流无不

反复强调读书的重要，对读什么书、如何读书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详细阐述。上自先秦诸子至六朝学者的劝学言论，下及明清和近代学者所撰大量的读书志、读书记，仔细阅读、悉心体味这些凝聚着先哲们毕生心血的读书治学经验，我们一定会感觉到我国读书理论与读书方法的博大精深，能掂量出这份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的厚重与珍贵。

我国传统读书理论强调读书以“立志”为本，以“修身”为用。立志，是指确立读书的志向，制定读书的目标。立志，才能保证在阅读中不为流俗媚语游移志向，亦不单凭兴趣嗜好泛看漫读，以避免“玩书丧志”，荒废岁月，甚至迷失人生目标的悲剧。修身，是指通过读书达到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目的。只有十分注重自身道德、操守培养的人，处世才能以公事为先，以国事为大，才能将自己的学识才智无私地奉献于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的大业。

读书立志，尚须讲究方法。读书方法，实际上伴随着阅读活动的开始就产生了。受时代学术风尚和个人治学倾向的影响，我国传统读书方法既有如学思结合、师友切磋、读行相济、博约相兼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又有如东晋陶渊明“会意法”、宋苏轼“八面受敌法”、南宋陈善“知出知入法”等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方法，可谓丰富多采，精彩纷呈。儒学大师朱熹是古代读书法的集大成者，他系统研究了自孔子以来的读书理论和读书方法，提出了一整套指导学生读书的方法，经其弟子节取荟萃，归纳成 24 字，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朱熹 24 字读书法长期以来为读书学子奉为圭臬，后世学者论读书方法也都不出其范围。

我国的读书传统，充满着勤奋刻苦的精神。寒窗读书，孤灯相伴，寂寞长随，没有一点刻苦精神是难成“正果”的。千百年来，孔子“韦编三绝”、苏秦“引锥刺股”、董仲舒“三年不窥

园”、刘向“天禄燃藜”、匡衡“凿壁偷光”等勤奋苦读的故事，就是作为一种精神范型加以宣扬表彰的，以促成全民族的读书风尚，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永存的。

我们今天重视和强调读书传统，是为了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时代已进入 20 世纪末，即将迎来 21 世纪。我们的祖国和民族需要跨世纪的人才，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朋友，面临着更为艰苦的学习任务。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各种各类读书活动正在中华大地蓬勃开展。1995 年初，广西师大附中的校园里落成了一座以“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为主题的“读书碑林”，碑林拥有近百块中国当代文化名人论读书以及爱国主义题材的碑刻，以激励师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心。一场以“振兴中华”为宗旨的全国性读书运动正方兴未艾。

本书旨在介绍中华读书传统的精华，以书文化知识和名人读书藏书活动为主体，大致包括古代书籍制度和书文化知识，古代劝学传统与读书方法，历代藏书佳话与读书典故，名人读书风采与论学隽言等内容。我国历代文化名人都雅爱读书，他们在优秀文化典籍中接受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熏陶，在自己拥有的书香天地里勤奋耕耘，创造辉煌。本书各篇广采文献记载和名人自述，重点介绍 50 余位历史名人的读书藏书活动及其文化建树，注意总结揭示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希望以此激发我们的读书热情和创造欲望。

我国读书理论的奠基者，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大意是说对于任何学问或事业，仅仅了解和喜爱还不够，必须以其为乐，才能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直至成功。他自己就达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相信每一位有志者都能在坚持不懈的读书中受益终生。

目 录

1	导 言
1	书籍的产生及其早期形态
7	纸与印刷术
19	古代书籍制度
30	六略四部：古代图书分类
35	金匱石室：历朝政府藏书
44	中华文献宝库： 《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
52	千年文化典籍的历史命运
68	藏书印与藏书题跋
73	诗书教子与金玉传家
80	古代劝学传统
89	传统读书方法
97	四时读书乐
103	轮扁谏读书
107	读书环境与书斋布置
112	古人读书斋名的 自然气息与人文意蕴
117	读书灯下读书声

DIS7/26

目 录

122	读书人的藏书与惜书
128	秋林·松风·读书图
133	历代楹联中的书情读趣
138	古代读书诗文品味觅趣
143	昭明读书台与扬州文选楼
147	庐山与历代读书史迹
152	历代藏书佳话与读书典故
161	宛委二酉·太乙藜杖·琅嬛福地
169	刺股·悬梁·凿壁
174	聚萤·映雪·随月
181	囊萤·曝书·芸香
185	书淫·书痴·书中蝴蝶
190	康成书带草
195	少壮三好图
200	孔子论读书治学
205	宋欧阳修论读书
209	洛阳城中两书翁
215	宋曾巩南轩读书

目 录

219	宋赵明诚、李清照 归来堂读书情趣
223	宋陆游的读书诗与读书情
227	宋杨万里的读书诗文
231	宋朱熹读书法纲要
236	元赵孟頫论读书乐趣
240	江南书城天一阁
245	明汤显祖玉茗堂读书
249	祁承燾与澹生堂
253	明陈继儒与《读书十六观》
257	虞山书香汲古阁
262	清傅山霜红龕读书情
266	海内第一读书人朱彝尊
271	清蒲松龄论读书做人
276	清袁枚与书的缕缕情丝
280	清法式善、麟庆的读书因缘
285	清魏源的读书治学及其成就
289	清末四大藏书楼
297	解题书目与读书指导

书籍的产生及其早期形态

书籍是人类表达思想、介绍经验、传播知识的重要工具，由记录载体（纸或其他材料）和表达一定知识内容的记录符号（主要是文字）组成。书籍是人类有意识创作的精神文化产品，它的产生与人类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书籍。我国早在 3000 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书籍，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无论是书籍的生产材料或生产方式，都发生了伟大的变革，积累了种类齐备、数量众多的文化典籍。

书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标志是文字的产生，没有文字就没有书籍。了解我国书籍产生发展的历史，也要从文字的起源开始。

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古代有苍颉（一作仓颉）造字的传说。据古书记载，苍颉是轩辕黄帝的史官，生有异相，长着四只眼睛，灵光炯炯。他从鸟兽的脚印得到启发，创造了古书上经常提到的早期蝌蚪文字。明代赵世英有诗句：“凿空鸟迹写心灵，万斛珠

玃科斗侈”，写的就是这一传说。相传苍颉造字时，惊动天地鬼神，天降五谷，鬼神夜哭。苍颉造字的传说，在古代有广泛的影响。陕西西安市西南约 15 公里处有“苍颉造字台”遗址，古代尊视为圣迹，唐代诗人岑参游览瞻仰后，留下了“空阶有鸟迹，犹似造字时”的诗句。陕西洛南县西北元扈山也有“苍颉造字处”的遗存，山壁上隐约可见“兽蹄鸟迹”等 28 个字，相传是苍颉的手迹。

文字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逐渐形成的，汉字同样是汉民族共同创造的。关于苍颉造字，比较可信的解释是：苍颉作为朝廷主管文字记事的史官，较留意文字问题，他曾对当时流行的文字进行过一番开创性的整理加工工作。苍颉是 4500 多年前的人物，关于他造字的传说，说明了远在他之前，汉字就开始产生了。

人类在劳动中产生了语言，通过语言交流思想，传达感情，通告事情。在远古时代，语言交流只能面对面进行。当需要将某种想法、某件事情通告周围的人，或者传给后人，就必须用符号把语言记录下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在汉字诞生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在记录语言问题上，经历了结绳和画图的阶段。

我国先秦典籍中，明确记载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结绳记事的史实。所谓结绳，就是把绳子打成各种结子。绳结的大小、间距、式样、颜色等分别表示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一定的部落内约定俗成。结绳就开始成为部落成员交流思想感情，传播知识经验的工具。《庄子·胠篋篇》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庄子文中所说的人物都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上古帝王，后人就称他们的时代为结绳时代。

先秦儒家经典《易经》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

之以书契。”肯定了结绳是汉字的先驱。结绳记事的确比单凭记忆方便可靠，但是时间越长，绳结越多，哪个结子表示什么意思，就很难弄清了。再说，简单的绳结怎么打也难以表达复杂的事情。于是，结绳就慢慢向画图发展。

图画是文字的前身。大约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 60 万年至 1 万年），人类就会通过图画表达思想。如相约狩猎，就画一头野牛或一头鹿，加上一个手持弓箭的人。最初的图画比较复杂，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提高，图画的结构和笔画开始简化，趋向概括，逐步演进为象形符号。根据现代考古研究发现，在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百余件彩陶上，有着许多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半坡遗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城东，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有 6000 多年。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经出现象形刻符。从图画简化为象形符号，就意味着文字的起源。陵阳河遗址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 4000 多年。

由于缺乏更多的史料证明，汉字起源的确切时间目前尚难以说清。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可大致推断距今 6000 至 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为汉字酝酿萌芽时期，汉字发展到距今 3000 多年的殷商时代，已成为相当成熟的文字。这些文字大都刻写在甲骨上，所以称为甲骨文，随之就出现了我国书籍的早期形态——甲骨的书。

商周时期的书籍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 3500 多年前的殷商时代。这些文字记载，就是甲骨文。所谓甲骨文，是指用利器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的古文字。它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中被发现的。这一发现，揭开了我国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1899 年，清末大学士、山东福山人王懿荣身患疟疾，延请

中医开方治病，所开药方上有一味“龙骨”。王懿荣派家人去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场的达仁堂药店抓药，买回后发现龙骨上刻有文字。王懿荣是位精通金石文字的学者，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未曾见过的古文字，马上命家人赶去达仁堂，把尚存的龙骨全部买回来。面对这一大堆龙骨，王懿荣如获至宝，一头钻进去，专心致志地研究整理。经王懿荣考订，确认这是商代遗留的甲骨文字。

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原先是河南安阳农民在耕种时，于黄土层下掘得的。后误作龙骨卖给药店充当治病的药物。一经王懿荣的研究确认，这些甲骨作为珍贵的文化史料，立即身价百倍。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近代著名学者，先后悉心从事甲骨的搜集、研究工作，共同把甲骨学研究推向高潮。经他们研究，肯定甲骨是殷商时代的一种文书，广泛记录着那个时代迄今无人知晓的史事，是珍贵的古史研究资料。他们还进一步判定出土甲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是殷商都城的遗址，就是古书上早就提到的“殷墟”。罗振玉还多次赶赴实地考察，为大规模科学发掘奠定了基础。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首次组织对安阳小屯村殷墟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截止1979年，共出土甲骨近5万片。经整理，上面所刻的甲骨文字有4000多个，目前已能辨识其中的三分之一，其余有待进一步研究考释。

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这些甲骨是3000多年前商王盘庚迁都殷地到商纣王亡国273年间的遗物。商朝统治者极端迷信神权，一举一动都要事先举行占卜问神仪式，预测吉凶。甲骨文就是占卜情况的记录，所以又称为卜辞，其内容广泛涉及国家政治、军事、狩猎、农业、畜牧、天文历法、疾病、祭祀等，反映了商朝中后期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基本情况。

甲骨文作为占卜情况的记录，主要是供日后验证使用，属于史官掌握的王室档案。对此，刘国钧先生在《中国书史简编》中

这样认为：“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它所记载的资料对古史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但是必须认识到甲骨本身是有特殊用途的，它上面的记载不是为了传播知识、总结经验，而是为了事后的稽查考核。所以，就其本质来说，它是档案而不是书籍。但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具有书籍作用的。”1976年，陕西省周原地区出土了1万多片西周时期的甲骨，其中一部分也刻有文字，并在甲骨上穿有供串联的小孔。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曾发现刻有“册六”二字，而且有穿孔。因此，有学者推测在那时候，甲骨就可能已串联成册。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就被人们称为“甲骨的书”。

商朝建立后，随着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的发展，我国开始出现制作精细、造型优美的青铜器，并一直沿用到西汉末年。青铜器是一种铜锡合金的器物，种类很多，据清代学者统计，共有40多种，其中有名为簋、敦的食器，有名为尊、爵等的酒器，有名为鼎、鬲、甗等的炊器，还有盘、盂等日用生活器皿。这些青铜器主要供王室贵族们举行祭祀、宴享、婚冠等隆重仪式时使用，所以称做“礼器”或“吉金”。

商周时代的统治者，以及王公贵族、各国诸侯，每逢喜庆大事，他们都习惯于专门铸造一件青铜器留作纪念。这类青铜器往往铸有文字，说明铸器的时间、原因等，有的青铜器上还铸刻着重要的文件、史实。如西周的“毛公鼎”，有文字497个，记述周宣王中兴的史事；“散氏盘”有350个字，是一篇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交散氏时所订立的契约。

青铜器上的这种文字叫做“铭”，后人统称为“金文”。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始于商代晚期，开始时铭文只有很少几个字，现存商代最大的青铜器为“司母戊”鼎。“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重875千克，但只在鼎腹内刻“司母戊”三字。西周中叶至战国末年，开始出现多达数百字的长篇铭文，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1976年冬，陕西省扶风县出土的“墙盘”有铭文284字，记

载周文王以下 7 个西周君王的治国功绩，成为周初的第一手文献史料。1978 年，湖北省博物馆组织发掘位于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的曾国君主乙的墓葬，出土随葬品 1 万余件，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套 65 件的整套编钟。这套编钟是一组青铜乐器，上面共有铭文 2800 字，较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与曾国的各种音乐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反映出当时各诸侯国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相互交流的情况，为我们研究先秦音乐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

很显然，青铜器本身无论从哪一方面论证，都不属于书籍，但它们身上的铭文给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内容。这些铭文除了与已有的历史典籍相印证，还包括了大量历史典籍失载的重要史实，起到了书籍的作用。所以，我们通常把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记载统称为“青铜的书”。

青铜器在统治者看来，是自己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都把青铜器作为殉葬品，埋入地下。汉代以来，青铜器代有出土。据徐中舒主编的《殷周金文集录》的统计，新中国建立后 30 年间，发掘出土的商周有铭文的青铜器近千件。现在，我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各省博物馆都收藏有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向我们展示着古代劳动人民辉煌的科技和文化艺术成就。

上述“甲骨的书”和“青铜的书”，实际上只是以甲骨和青铜为书写材料的官方文书档案，它完全由史官记录并掌管，在当时并没有发挥书籍传播知识的基本作用。不难想象，写在甲骨或青铜器物上的文字，是很难方便地供人阅读和携带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大约在西周，也就是在青铜器物上铸刻铭文之风盛行的时候，人们同时尝试着把文字写在竹条木片上，逐渐形成以竹木为书写材料的书籍，书史上称为“简策”。我国的图书文化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纸与印刷术

纸与印刷术是书籍这一精神文化产品得以发展的基本的，也是关键的条件。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这两项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技术，都是由中国人民最早发明的。它们与火药、指南针并列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纸与印刷术的起源及其发展历史，一直是我国，甚至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英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博士曾经说过：在所有人类文化史上，没有能比纸与印刷的发展更重要的题目了。北京图书馆的张秀民先生穷其毕生精力，撰写了一部《中国印刷史》。这部 60 余万字的煌煌巨著，对我国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至清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的古代印刷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阐述。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为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了第五卷第一分册《纸与印刷》。钱先生在书中依据详尽确切的史料，用优雅的文笔，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纸与印刷技术的历史发展轨迹，精辟地阐述了这两项发明的伟大历史意义。本文所叙述的，是关于纸与印刷术的最基本的知识，使我们对自己祖先的这两项辉煌的发明，有起码的了解。

纸的发明与蔡伦的贡献

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纸，但纸究竟是一样什么东西，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十分清楚的。简单地说，纸是一种片状的纤维制品。它的基本生产工艺流程是：先把植物纤维原料打成纸浆，第二步使纸浆中的纤维分离而悬浮在水中，然后在滤网（竹帘）上均匀脱水。这时纤维已在网上交错组合形成平面，最后压榨烘干，成一张张薄片。纸就这样诞生了。

关于纸的发明权，过去人们都根据公元5世纪南朝宋史学家范曄所著《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归之于东汉的蔡伦。据范曄讲，蔡伦把造纸的发明报告和实物上献给汉和帝刘肇，刘肇大加赞赏，从此纸就风行天下。这一年是汉和帝元兴元年，就是公元105年。蔡伦大约也因造纸事而晋封为龙亭侯。所以当时有“蔡侯纸”之称。古代就已有不少学者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论断提出异议，但是缺乏确凿的实物证明。1957年西汉灞桥纸出土，有力地否定了蔡伦的发明权，把古代造纸术的发明时间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1957年5月8日，陕西西安市郊灞桥砖瓦厂工地的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叠古纸残片，纸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当时化验报告确定为丝质纤维纸。后来有关专家多次取样切片检验，一致鉴定是一种麻类植物纤维纸，并命名为“灞桥纸”。该古墓经考古鉴定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在灞桥纸发现的前后，陆续有新疆罗布淖尔纸、甘肃居延金关纸、陕西扶风中颜纸、甘肃天水放马滩纸（都以出土地命名）第7种西汉古纸出土。这些经现代科学检测手段确认的古纸实物，确凿无误地证明我国古代造纸术产生于西汉。

我国古代造纸术产生于西汉并不是偶然的，西汉时期已经很